

評介 Kimie Hara, *Cold War Frontiers in the Asia-Pacific: Divided Territories in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Hara Kimie. *Cold War Frontiers in the Asia-Pacific: Divided Territories in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2007. 247 pages

陳冠任**

壹、前言

長期以來，冷戰史學者的目光主要放在發生在西歐、東歐及中歐的美蘇衝突，至於亞洲冷戰的發展則長期遭到忽略，直到 1974 年入江昭的 *The Cold War in Asia: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一書方開啟了亞洲冷戰史研究的濫觴。¹ 入江昭主要敘述了雅爾達體系 (Yalta System) 的形成，以及該體

* 本文得匿名審稿人惠賜卓見，在此謹申謝悃。撰稿期間，承蒙指導教授 Professor Andrew Preston (Professor in American History, Faculty of History, Clare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及副指導教授 Dr. Barak Kushner (Reader in Japanese History, Faculty of Asian & Middle Eastern Studies, Corpus Christi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多次撥冗細心指導，在此由衷地表達感謝之意。此外，本文亦感謝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蔡振豐先生與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黃仁姿小姐的潤飾，使得拙文能以較為流利的中文呈現在讀者面前。然所有文責仍由筆者自負。

收稿日期：2015 年 6 月 17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5 年 8 月 4 日。

** 英國劍橋大學基督聖體書院歷史學院博士候選人

¹ Akira Iriye, *The Cold War in Asia: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74).

系如何在韓戰、兩次臺海危機及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中轉變與逐步崩解。

繼入江昭的研究之後，愈來愈多學者開始研究亞洲冷戰的起源，例如 Mark Gallicchio²、Odd Arne Westad³、沈志華⁴，以及陳兼⁵等人咸認為韓戰的爆發，使得原本美、蘇盡力在亞洲維護的雅爾達體系遭致破壞。日本學者原貴美惠（Hara Kimie）則透過 *Cold War Frontiers in the Asia-Pacific: Divided Territories in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一書探討了雅爾達體系之後，美國如何藉由模糊爭議性領土的歸屬，逐步建立符合其國家利益的舊金山體系（San Francisco System）。⁶

原貴美惠目前為加拿大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東亞研究教授（Renison Research Professor in East Asian Studies）。原教授畢業於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研究專長為亞太地區研究、邊疆研究、冷戰史研究，以及當代日本政治與外交研究。近年來，將研究重心放在「舊金山和約」的實踐、日本領土問題與區域研究等。其主要著作有：*Cold War Frontiers in the Asia-Pacific: Divided Territories in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與 *Japanese-Soviet/Russian Relations since 1945: A Difficult Peace*，⁷ 編有：*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and its Legacies: Continu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Historical Reconcili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⁸，以及 *Northern Territories, Asia-Pacific Regional Conflicts and the*

² Marc Gallicchio, *The Cold War Begins in Asia: American East Asian Policy and the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Marc Gallicchio, *The Scramble for Asia: US Military Power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Pacific War*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³ 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4-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⁴ 沈志華，《毛澤東、史達林與朝鮮戰爭》（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沈志華，《冷戰在亞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沈志華、李濱（Douglas A. Stiffler）主編，《脆弱的聯盟：冷戰與中蘇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⁵ Jian Che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4).

⁶ Kimie Hara, *Cold War Frontiers in the Asia-Pacific: Divided Territories in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2007).

⁷ Kimie Hara, *Japanese-Soviet/Russian Relations since 1945: A Difficult Peace* (London: Routledge, 1999).

⁸ Kimie Hara, ed.,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and Its Legacies: Continu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Aland Experience: Untying the Kurillian Knot*⁹ 等。

近年來，由於釣魚臺主權問題牽動著臺海兩岸政府與日本的敏感神經，以及南海上西沙群島與南沙群島的爭議，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共）與東南亞各國衝突日益增加，對於亞太區域安全已造成影響，甚至引起美國的關注。美國副總統拜登（Joe Biden）在 2015 年 5 月 22 日於海軍軍校畢業典禮上即表示，南海將成為美國未來維持亞太區域和平的重點所在。¹⁰ 因此，本書出版至今雖已 8 年，但隨著西太平洋海域爭端的激化，實有必要將本書引介給讀者，藉此理解現今爭端的緣由。

貳、內容介紹

本書從美國內部擬定「舊金山和約」草案的過程，觀察美國如何塑造新的東亞國際秩序。作者認為，東亞國際新秩序就是從雅爾達體系過渡到「舊金山和約」的過程中逐步形成，而此一新的舊金山體系也為諸如臺灣、千島群島、尖閣諸島（又稱釣魚臺，為行文方便，以下一律稱尖閣諸島）與竹島（又稱獨島，以下一律稱竹島）等議題埋下了紛爭的種子。作者將上述議題置入歷史的脈絡之中，分析這些爭議如何在舊金山體系建立的過程中產生。本書除了前言與結論之外，共分成 7 章。

首先，作者在第一章〈韓國：分裂的半島與獨島／竹島〉（Korea: The Divided Peninsula and the Tokdo/Takeshima）中處理了竹島問題。作者指出，對美國而言，1945 年雅爾達體系建立的目的是在於維持與戰時盟友，特別是與蘇聯的合作。此外，美國亦將去除日本軍國主義與扶持一個統一而穩定的中國，視為穩定亞洲局勢的基石。然而，美蘇關係從 1947 年由合作走向對立，¹¹ 以及翌年兩個韓國的

Historical Reconcili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2014).

⁹ Kimie Hara and Geoffrey Jukes, eds., *Northern Territories, Asia-Pacific Regional Conflicts and the Aland Experience: Untying the Kurillian Knot* (London: Routledge, 2009).

¹⁰ Brian Witte, "Biden discusses Asia-Pacific region at Navy graduation," *The Washington Times*, May 22, 2015.

¹¹ Melvyn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建立，都逐步地動搖著雅爾達體系，1950 年北韓入侵南韓後，亞洲的雅爾達體系即告結束。隨著冷戰在亞洲的激化，美國將日本視為其在亞洲的重要堡壘，對日態度逐漸從懲罰過渡到寬容 (from punitive to generous)，¹² 如此轉變也促使竹島問題的產生。

戰後初期，美國認為竹島是屬於韓國的一部分，甚至在前幾次擬定的「舊金山和約」草案中，國務院也贊成將竹島歸還給韓國。然而，隨著美、蘇對立激化，以及朝鮮半島的局勢愈來愈詭譎不定，美國基於戰略考量，遂於 1949 年將竹島問題從「舊金山和約」中移除。美國在塑造竹島主權模糊的同時，又在口頭上支持日本擁有該島的主權，但在缺乏明文條約的法理下，竹島至今仍在挑動日、韓政府的敏感神經。

第二章為〈福爾摩沙：跨越臺灣海峽的問題〉(Formosa: The Cross-Taiwan Strait Problem)。雖然在「雅爾達密約」中沒有提到臺灣問題，但是太平洋戰爭的經驗讓美國體認到太平洋地緣政治學的重要性，激起美國在臺灣建立軍事基地的興趣。美國內部對於臺灣主權的歸屬早期以「開羅宣言」作為依據，例如，1944 年 4 月 20 日 CAC (Country and Area Committee) -152 文件中便提到：「臺灣將無條件歸還給中國，而中國政府也計劃將臺灣作為中國的一省」(Formosa will be returned to China without reservation an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lans to make Formosa a separate province of China)。同年 6 月 24 日，在 SWNCC (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59/1 號文件中也提到：「臺灣與澎湖應該根據『開羅宣言』歸還給中國」(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Islands are to be returned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airo Declaration)。戰後，隨著冷戰格局逐步確立，但美國對於臺灣歸屬的態度依舊不變，例如美國國務院在 1947 年 3 月對日和約的草稿第二款 (Article 2) 中也明確指出，日本應將放棄的臺灣交還給中國 (Japan's cession of Formosa to China)，這項草案迄 1949 年秋天中國共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02.

¹² 洪沢尚子 (Naoko Shibusawa) 指出，1947 年美國除了改變日本的占領政策之外，也開始消弭美國人對於日本人的民族仇恨，具體方式是將日本人女性化或將其視為一個不成熟的青少年，如此來將日本人再度「人化」。參見：Naoko Shibusawa, *America's Geisha Ally: Reimagining the Japanese Enem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產黨勝利之後依然沒有改變。

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國對華政策出現轉變，連帶地影響臺灣的歸屬問題。為了避免臺灣遭到共產勢力占領，致使美國太平洋地區的圍堵政策出現缺口，美國決定模糊臺灣的歸屬權問題。1950年8月7日由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監督下的草案中便把「日本將臺灣交還(cede)給中國」的字樣移除。此時英、美兩國的中國政策內涵互異，英國希望條約中能明確規定臺灣必須「歸還給中國」，但究竟是哪一個中國？英、美兩國的認知出現了爭議。最後，兩國協調後英方讓步，在1951年5月3日英、美的共同草案中，「日本將臺灣歸還給中國」的字眼正式從草案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可以選擇跟哪一個中國建立關係，而臺灣的未來則不在和約中決定。作者認為，臺海兩岸的分裂並非僅是兩個中國之間的事務，也連帶影響了「舊金山和約」的內容，以及影響臺灣未來的主權歸屬，而和約終究只是亞太地區冷戰之下的產物。

現今反映美、蘇冷戰與美國圍堵政策確立的另一項議題，係日、俄之間北方四島的問題。作者在第三章〈千島群島：北方領土問題〉(The Kurile Islands: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Dispute)中解釋了北方領土問題的緣由。

在「雅爾達密約」中，千島群島原本作為蘇聯對日宣戰的報酬，但隨著美、蘇關係惡化、蘇聯成功發展原子彈，以及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擴張，使得美國對於北方四島的態度出現了轉變，這其中的轉變從國務院內對日和約草稿的變化可以得知。例如國務院在1948年1月的草稿中，明確地將千島群島南端4個小島：國後、擇捉、色丹與齒舞全摒除於日本領土範圍之外；然而，這4個小島的名字又在1949年10月11日重新出現在日本領土之中。1951年5月，英美聯合草案中正式確立了日本必須放棄1905年「樸資茅斯和約」(Treaty of Portsmouth)的協定，放棄千島群島與部分庫頁島的權利。然而，作者指出，北方領土問題如同臺灣問題般，由於並未明言日本所放棄的領土將歸還給何國，以及對於千島群島的範圍沒有明確的定義(頁72)，使得這4個爭議性島嶼的歸屬權爭議延續至今。

除了上述爭議性島嶼外，美國同時也運用擬定對日和約的機會，建構其戰後太平洋地緣政治的戰略部署。在第四章〈密克羅西亞：一個美國的湖泊〉(Micronesia: “An American Lake”)與第五章〈南極洲〉(Antarctica)即為顯例。

密克羅西亞位於太平洋中部，原為德國的殖民地，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聯盟交由日本作為委任統治地（the League of Nations mandate）。隨著日本帝國的瓦解，密克羅西亞的歸屬權成了國際問題。由於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經驗，使得美國開始關注戰後密克羅西亞的後續處理問題。

針對此一議題，戰前美國內部出現兩種意見，其中軍方希望可以兼併（annex）這些群島，作為美國的軍事基地，進而保護美國的國土安全。然而，國務院方面卻反對這項併吞方案，因為有損美國「不擴張領土」的宗旨。為此，杜勒斯特別向軍方解釋密克羅西亞問題不僅是單純的軍事戰略問題，也是國際問題，因為國際間都在關注美國是否有能力參與國際事務，因此，託管比併吞更可以展現美國的能力。幾經協調後，杜魯門總統於 1946 年 11 月 6 日宣布託管密克羅西亞，繼於 1947 年 2 月 26 日向聯合國提交託管計畫並獲得同意。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託管性質是屬於「戰略託管」（strategic trusteeship），意即託管方可以基於安全考量，修築任何防禦工事，這讓美國合法地占有密克羅西亞。

蘇聯雖然對美國的託管持反對態度，但是由於其關注的焦點為千島群島問題，而非密克羅西亞；且蘇聯認為對日和約簽訂在即，倘若在該議題上與美國發生衝突，恐影響日後千島群島的交涉。因此，蘇聯在聯合國中並未動用否決權，使得美國的託管提議案得以通過，如此也使得美國單獨控制密克羅西亞，從舊金山到菲律賓這段區域成了「一個美國的湖泊」（頁 189）。

此外，作者在第五章解釋了「舊金山和約」第二章第二條第 e 項，即日本宣布放棄南極活動的一切權利的制定過程。南極大陸並未受到二次世界大戰戰火的波及，但隨著戰後英國、阿根廷及智利接連宣稱擁有南極大陸的主權，讓美國意識到這極有可能增加其北約盟邦與美洲相互援助條約盟邦（Latin-American Rio Treaty）之間的緊張。有鑑於此，美國開始籌劃透過託管或是多國共享權利（multi-national condominium of interested powers）將南極問題國際化。

雖然日本從未正式宣布其對南極大陸的主權，但 1910 年白瀨矗的南極探險有可能成為日本日後宣布其對南極主權的依據，因此「舊金山和約」有處理日本在南極大陸權利的必要。英國最初的提案是試圖消除日本在南極的所有權利，但是 1951 年後，基於對蘇聯勢力的恐懼，英國遂轉變其原本立場，反倒不希望日

本放棄在南極的一切權利。有趣的是，儘管共產主義在亞洲橫行，但同為英聯邦國家的澳洲和紐西蘭，卻因為二戰的經驗，對日本仍抱有恐懼的態度，因此兩國的立場反倒和美國相同，即主張日本放棄在南極地區的一切權利。經過英、美協調後，一如其他議案，「舊金山和約」中關於南極問題，最終還是遵循美國的草案；但美國為了讓日本迅速恢復經濟，同時也為減輕美國的負擔，在和約中並沒有限制日本在南極捕鯨的權利。

第六章為〈南沙群島與西沙群島：南海爭議〉(The Spratlys and the Paracels: The South Sea Dispute)。近年來，中華民國、中共、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汶萊，皆宣稱或部分宣稱擁有南沙群島的主權；此外，中華民國、中共及越南也宣稱擁有西沙群島的主權，這使得南海問題成了東亞國際政治的火藥庫。

南海問題不像尖閣諸島、竹島以及北方領土問題等聚焦在是否為條約中日本所應放棄的領土，因為不管是南沙或西沙，早在戰前已有爭議，只是主角從中國、日本及法國，變成了中華民國、中共與東南亞國家。

早在 1943 年美國就開始討論南沙與西沙群島問題，原先是計劃交還給菲律賓或是提交國際共管，但幾經思量及與英國協商後，「日本必須放棄西沙與南沙群島的一切權利」等相關字句並未在英、美的聯合草案中出現。最後「舊金山和約」中第二條第六項：「日本政府放棄對南沙群島與西沙群島的一切權利、名義與要求。」乃是 1951 年法國基於自身在東南亞的利益所提出。作者分析美國會同意法國此一提案的原因，在於阻斷中共日後宣稱對這些島嶼主權的所有可能性，雖然這為日後的南海爭議埋下了伏筆，但在當時卻是圍堵中共最為便利的方式(頁 157)。

在最後一章〈琉球群島：沖繩與尖閣／釣魚〉(The Ryukyus: Okinawa and the Senkaku/Diaoyu)中，作者處理了近年來頻惹爭端的琉球與尖閣諸島問題。作者認為當今的尖閣諸島問題浮現於 1970 年代初期，爭議點在於尖閣諸島究竟是屬於琉球的一部分，還是應被視作臺灣的一部分，連同臺灣在「舊金山和約」中被日本宣布放棄一切權利。

雖然在戰時的國際協議中，諸如「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及「雅爾達協

定」，皆未明確說明尖閣諸島或琉球的處置問題，但美國從 1943 年開始關注琉球問題，戰後更是展現了對琉球的興趣。然而，國務院與軍方卻對如何處置琉球意見互異。國務院認為占領或是託管琉球將會增加美國的財政負擔，而在琉球建立軍事基地也有刺激蘇聯的可能。因此，從 1947 年 8 月國務院的對日和約草案中可知，美國原計劃讓日本保有琉球，但必須放棄小笠原群島的主權。國務院的構想被軍方及政策規劃局 (Policy Planning Staff) 的凱南 (George Kennan) 強烈反對，因為兩者皆認為，如果美國無法絕對控制琉球群島的話，將有損美國的國家安全。

隨著 1948 年杜魯門總統 (Harry Truman) 同意 NSC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第十三號報告後，對於琉球的長期保留 (long term retention) 成為美國的政策。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及 1950 年韓戰的爆發，琉球的戰略價值對美國而言益發重要，即便英國提議日本可以放棄琉球與小笠原群島，並交由聯合國託管，仍未能撼動美國的立場。最後在美國的堅持下，在和約中日本並未宣布放棄琉球與小笠原群島，而是交由美國託管。

1960 年代末期在尖閣諸島附近發現潛在的石油資源後，主權問題再度浮現。作者指出，美國對尖閣諸島的態度，在歸還日本前無庸置疑地認為尖閣諸島是屬於琉球的一部分。然而，隨著尼克森政權與中共政權接觸，尼克森不願因該島的主權問題與中共關係惡化，因此採取了「對於主權問題並無任何立場」(no position on sovereignty) 的政策，將琉球的行政權交還日本後，此一問題便留給日本、中華民國與中共討論。¹³

總而言之，作者透過上述個案，勾勒出從 1945 年所建立的雅爾達體系到舊金山體系的建立過程，並進一步分析美國如何透過其影響力，在面對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時，模糊爭議性地區的主權歸屬，並從中部署有利於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建構屬於美國的東亞國際新秩序，同時為日後圍堵中共埋下了伏筆(頁

¹³ 作者指出尼克森將尖閣諸島問題當作面對日本與中共時的一種辭令。在面對日本時，美國藉由強調「中共的威脅」與「防衛日本」來使其在沖繩的駐軍更可被日本人接受。在面對中共時，美國可以利用中共對於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畏懼，宣稱在沖繩的美軍是要防止此現象的發生。參見 Kimie Hara, *Cold War Frontiers in the Asia-Pacific: Divided Territories in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p. 181.

188)。

叁、特色與商榷

過去學界在探討爭議性島嶼問題時，偏向於就單一個案，從法理層面探討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卻未能將這些議題置入歷史脈絡之中，探討問題從何而來，使得研究觀照的面向相對有限。有別於此，作者將歷史的鏡頭拉到了雅爾達體系崩解後，從美國外交史與冷戰史的角度，探討東亞國際政治權力真空之際，美國如何建立屬於「自己的」舊金山體系。作者以美國草擬「舊金山和約」的過程作為主軸，輔以不同的國際政局發展，例如中國內戰、韓戰以及日俄關係等，將發生在亞太地區的爭議性領土議題相互串聯。本書非但填補了二戰後東亞國際關係史的研究空白，也提供了理解現今國際問題的另一種視角，誠屬重要之貢獻。

有別於國際關係學者多從區域安全的角度著手研究舊金山體系，¹⁴ 原貴美惠透過扎實的檔案分析，還原了美國內部如何逐步地建構屬於其的舊金山體系，可謂本書的另一貢獻。作者大量運用庋藏於美國國家檔案館的檔案，特別是國務院檔案 (RG 59)、規劃戰後秩序相關部門的微捲以及美國外交文書 (FRUS)，仔細地爬梳美國國務院及相關部門歷次修改「舊金山和約」草稿，分析美國之東亞政策如何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化，從「舊金山和約」草案的修改過程勾勒出美國內部對於戰後東亞秩序藍圖的規畫。同時，作者也運用多檔案對照法，運用英國外交部檔案 (FO371、FO381)，探討美、英之間在面對衝突時（特別是中國問題）居中協調的過程，以及美國如何運用其戰後強國的優勢，說服英國接受其所擬定的草案。

除了研究取徑與史料外，本書的第三個貢獻為替該議題奠定研究基礎，與拓

¹⁴ 例如：Kent Calder, "Securing Security through Prosperity: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Pacific Review*, 17:1 (March 2004), pp. 135-157; Kent Calder, *Pacific Defense: Arms, Energy, and America's Future in Asia* (New York: W. Morrow, 1996); Leszek Buszynski,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Contemporary Meaning and Challenges," *Asian Perspective* 35:3 (July-September 2011), pp. 315-335.

展未來可以進一步發展的研究方向。2015 年，在該書的基礎之下，原貴美惠編輯之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and Its Legacies: Continu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Historical Reconcili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一書，進一步結合各國知名學者，如林滿紅、John W. Dower、Konstantin Sarkisov、Nong Hong、Seokwoo Lee，以及 Unryu Suganuma 等，透過各國檔案，從不同的視角探討舊金山體系所遺留的爭議性領土問題，使該議題的研究成果更臻完善與豐富。

然而，筆者認為該書中的若干論述仍值得商榷。首先，作者提到羅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 的個人外交被杜魯門的外交政策所取代 (頁 48)。事實上，杜魯門的外交政策是承襲自羅斯福的外交思想，即冷戰時期美國的干涉主義 (interventionism) 早在羅斯福時期便已形成。換句話說，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思想的主軸在羅斯福時期已然確立，而羅斯福和杜魯門外交政策最大的不同，在於因應國際情勢的「方法」，在基本主軸上並無太大的差別，更遑論「取代」。¹⁵

另一個值得商榷之處，為作者在解釋與詮釋草案修改過程的背後因素似略顯不足。在大部分的章節中，作者流於敘述在 T-Document (Territorial Subcommittee under the Advisory Committee on Post-War Foreign Policy)、SWNCC，以及國務院內部對於和約草稿的轉變，卻未進一步分析其中的變化、各部會的考量點以及協調的過程。另一方面，作者在處理美國與其他國家，尤其是與英國協調「舊金山和約」草案時，僅提到英國處處讓步，但未能深入分析此時英、美外交關係的結構為何，以至於導致最終的結果。除了英國之外，與其他國家交涉的部分也常為作者所忽略，例如第 119 頁，當作者論及面對美國託管密克羅西亞問題時，並未說明為何加拿大、印度、荷蘭、菲律賓與澳洲等國最後會撤回原先反對美國託管的建議。此外，在處理南極議題時，作者雖然提及美國亟欲將南極問題國際化，但這與處理日本與南極問題之間的連結性似亦稍嫌薄弱，較難說服讀者南極問題與舊金山體制之間的關聯性。

¹⁵ 根據 Andrew Preston 的研究，作為一位干涉主義者，羅斯福在 1938 年的一場爐邊談話 (Fireside Chat) 中便把美國的國家安全與世界體系相結合，而這個想法也影響到羅斯福往後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說，羅斯福設立了日後的冷戰結構與美國對外政策的藍圖。參見 Andrew Preston, "Monsters Everywhere: A Genealogy of National Security," *Diplomatic History* 38:3 (June 2014), pp. 477-500.

另一方面，雖然作者的研究取徑是從美國外交史的角度來觀察此議題，但似乎僅把東亞各國作為美、蘇冷戰的代理人，¹⁶ 並將東亞國際關係過度簡化成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對抗，而忽略了東亞實為一個複雜的有機體。因此，作者雖然參考了部分日文的二手研究，但對於中文檔案與二手研究的使用則較為缺乏，對於東亞相關各國，例如日本、韓國以及中華民國對於美國一連串措施的反應，以及這些反應造成了哪些影響，均未進一步說明，殊為可惜。筆者認為，倘若從美國外交史的角度觀察東亞國際關係史時，能連帶討論美國與東亞各國的互動，如此將更能豐富研究的內容。

最後，筆者認為本書所處理的議題皆與海洋有關，但作者似乎忽略了探討這些議題與美國戰後海洋政策的關聯性，特別是 1947 年太平洋司令部 (United States Pacific Command) 的建立、部署以及與美國規劃舊金山體系時的連動。筆者認為，倘若能將海洋此一地理空間作為探討冷戰時期美國與東亞各國之間互動的平臺，甚至進一步探討舊金山體系建立後，太平洋司令部在東亞冷戰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勢必能為冷戰史研究開拓更多值得探討的議題。

雖然本書尚有許多值得進一步討論之處，但筆者認為這依然無法掩蓋本書對於戰後東亞國際關係史的貢獻，而現今的諸多爭議，也如同作者於結論中所說的：「對日和約只是冷戰的副產品，它延續了重要的區域關係的影響至今。」(頁 187)

¹⁶ 美、蘇的盟邦是否真為其「代理人」，還值得進一步商榷。根據 Tony Smith 的研究，美、蘇的盟邦大多善用意識形態作為工具，爭取美國或蘇聯的援助，有些盟邦甚至試圖將這兩個超級強權帶入戰爭的泥淖中。參見：Tony Smith, "New Bottle for New Wine: A Pericentric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24:4 (October 2000), pp. 567-591. 另外，Immanuel Wallerstein 也有類似的論點，其認為東西陣營的國家常運用「冷戰」此一辭令強迫超級強權符合他們當地的利益，而這些國家的行為皆有可能破壞現狀，引發另一場世界大戰。參見 Immanuel Wallerstein, "What Cold War in Asia?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in Zheng Yangwen, Hong Liu, and Michael Szonyi, eds.,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Leiden; Boston: Brill, 2010), p. 19. 因此，美、蘇不一定能將其意識強加於其盟邦身上，讓他們真正做一個「代理人」，有些時候，可能還受制於這些盟邦。

